

# Another Aspect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 Literary Convergence From Sepa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to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Yongshi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ibin University, Yibi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545637731@qq.com

##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trends of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West forming in the 1960s-70s are the passive products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urvival crisis that human beings are being confronted with.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es,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commits itself to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social root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so as to provide human beings with a literary way out to solve it. The cause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western fundamental philosoph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differs completely from that of ancient China while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regarded as the main motivation of ecological thought trends, deserves to be perceived as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convergence from Western Sepa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to Chines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rather than an original western concept.

**Keywords:** Ideological Root, Ecological Literature, Philosoph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Chuang-Tzu, Correspondence.

## 生态文学的另一面——天人分合观的文学趋同

刘勇士\*

宜宾学院外国语学院, 宜宾, 中国

\*通讯作者. 邮箱: 545637731@qq.com

## 摘要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形成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是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之被动产物。作为其重要分支之一, 生态文学致力于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及社会根源, 为人类提供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学出路。生态危机的肇始源起西方迥于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哲学观, 而作为掀起和推动生态思潮的主要动力, 生态文学与其说应该视为是一个纯西方概念, 不如说应该视为是对于西方“天人相分”向中国“天人合一”的主动趋同的文学性解读。

**关键词:** 思想根源; 生态文学; 天人观; 庄子; 契合

## 1. 引言

18 世纪中叶, 蒸汽机经过改良, 人类社会从此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历次的科学与技术

革命成为推动这一加速进程的引擎。但是, 从更深层面去考察这种前进的真正动力——与其说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不如说是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 是自然一味过度的“施舍”。比尔·麦克基本指出, “风的意义、

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1】(41)而且“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1】(50)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不断地反省并考问自己：在与大自然数百万年的互动过程中，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歧途的？

## 2. 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客观条件的空间横向差异是人类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第一因素，而对于基本哲学命题天人关系所持有的不同看法——天人分合观决定各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 2.1. “天人相分”的积极作用

西方文明主要发轫于环地中海沿岸一带，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组成，其中一个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西方文明因而还有“两希文明”的别称。较之于其他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土地贫瘠，不利于农耕生产，更适合人们从事游牧活动；同时，由于拥有四通八达的海上航道，各地的商贸往来能得以频繁地开展起来。可以想见，古代西方人要避免生活中出现的流动性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也势必互构着他们思维层面所固有的抗自然的斗争性，促使他们勇于去探究客观物质世界。在《方法论》里，勒内·笛卡尔就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火、水、空气、星辰、天空以及所有环绕我们的自然物……利用它们所有的适用的方面，进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我们原本就是主人和占有者。”【2】所以，从古至今，西方世界的话语和实践都深受这种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思维指向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人们的心理层面上，进而架构起一种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对立性暗示，即“天人相分”的哲学传统。

“天人相分”是西方文明对于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是人们思维方式之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模塑出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二元论思想历经漫长的发展，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练之后，终于集大成地发挥出其积极作用来：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人们秉承“人定胜天”的精神，率先开始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而使之席卷全球。自此，人类社会开始实现由手工作坊劳动向机械化大生产的重大飞跃。而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热情地讴歌西方人不懈进取与开拓征服的精神。无论是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鲁滨孙漂流记》，还是晚期的现代主义作品《老人与海》，均可堪称为其中的扛鼎性代表。西方二元宇宙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工业文明为什么会最早兴起于西方的原因。

### 2.2. “天人相分”的消极影响

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使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逐渐从劣势转向优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只不过，从此开始，乡村牧歌式的田园风光离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代之以用钢筋、水泥建筑的如若丛林般的巨型城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结构被彻底地改变，人被现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禁锢成工业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奴隶，其自身的自然属性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并且无时无刻地不在受到侵蚀和剥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现象。这种“非人化”内含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作家创作的最重要元素。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极其突出地反映出工业社会的罪恶——它迫使人与人之间普遍产生离疏感、陌生感和孤独感，迫使整个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面临激烈的冲击和挑战。难道真会有这么一天：人自身的自然属性被彻底地改变而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非人化”的人？

回过头来思考一下：缘何原本一派欣欣向荣的人类社会现在却连累自然，深陷到如此糟糕的境地？西方哲学传统所主张的“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难辞其咎，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真正的思想根源。埃里克·史密斯是这样表述的：“把文化与自然从根本上分离的思想，在西方历史和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还有一些类似表述：自我 / 他者、主体 / 客体、灵魂 / 肉体等……这样的二元对立导致的弊端是：主体蔑视卑微的客体，文化把自然对象化。”【3】在分离自然和人类的同时，二元对立的天人观把前者只是当作后者的生存环境来看待，后者对前者进行的一切活动因而都成为理所当然的。多雷尔·德里斯更是使用了“具有破坏性的二元论观念”【4】一词。时至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等同于贪婪，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似已处于难以调和的失衡境地。

## 3. 生态危机的文学出路

实际上，生态系统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且一般来说，通过负反馈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该系统都能够修复外界所造成的损坏，做到维持其自身的稳定与平衡。但是，当外界的干扰超出其生态阈值点 / 带(ecological threshold point / zone)，即超出该系统维持自身稳定的临界限度时，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就随之丧失作用。在结构遭到破坏以致功能受阻的情况下，严重的伤害乃至崩溃就会降临整个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将被彻底地打破而最终引起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这并非杞人忧天。在 20 世纪后半叶短短 50 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的环境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严重污染和破坏，人类文明面临直接而现实

的威胁。不仅是现今这一、两代人正在受到影响，而且还将会殃及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和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日趋严重。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当代生态思潮首先在西方应运而生。显然，人类不可能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农耕社会，而只能依靠服务于生态系统之整体利益的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但是，如果人类的生态思维方式仅仅停留在科学和技术的层面，那将会是一种具有局限性视野的表现。除此之外，必须在文学参与程度的视阈下对生态危机施以更多的关照，即考量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学出路，以探寻危机产生的思想及社会根源。

虽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无情地鞭笞过工业文明对人类的异化作用，然而其作品却没能充分地做到关怀人类的终极命运；尽管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人们还是难以从中感到温暖，获得慰藉。直到1962年，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才标志着西方后现代主义之生态思潮开始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阶段，而作为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生态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掀起和推动这一思潮的主要动力，因为，奠定了生态思想之基础的就是生态文学家(利奥波德)，掀起这一思潮的关键人物还是生态文学家(卡森)。”【5】

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思想，也彻底摒弃“弱人类中心主义”、“开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新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环境主义的主张；人类的利益并不是生态文学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才是其追求的最高价值。因此，生态系统能否完整、和谐、稳定、平衡而持续地自然存在是生态文学考察自然与人类之间互动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同时它认为判断人类所有关联于自然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都应该限定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这一框架内。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坚持“人类非自然中心”和“人类利益非终极价值尺度”的主张，生态文学并不是在蔑视人类，甚至是在反人类。正好相反，面对现实存在的威胁以及可以预测的灾难性的生态恶果，生态文学家们正在大声疾呼：如果希望生态危机有一天能够真正而有效地消除，那么，人类只有在生态整体观的理论指导下，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自身一切行为的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能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中获得自身的根本利益，乃至长远利益。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说到底，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切也一定是有利于人类的。

#### 4. 天人分合观的文学趋同

生态整体主义的实质是西方对自身“天人相分”哲学传统的彻底否定，同时又具有了充分肯定“天人合一”的一面，因而生态文学就是对天人分合观的这一主动趋同所加以的文学性解读。

#### 4.1. 天人观的跨时空契合

因为生活在地理特征迥异的环境中，远古的华夏民族崇尚与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正好相反的“天人合一”传统。总的来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将古代中国的发展限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里；而幸运的是，大部分地区土壤比较肥沃，并且东亚季风常年带来丰沛的降水，农业相对地发达。由于有这种基本的生存条件作为保障，较之于古代西方，人们更易于做到衣食满足、居有定所，生活的流动性也就大大降低。因此，存在形成“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观的客观条件，而这样一种与客观物质世界融为一体的深层次心理结构迄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就提出了“道法自然”的伟大命题，认为人类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诚然，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像草发芽、树拔节一样，人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本能和维持生存的需求。然而，健康的保障却是来源于这种本能和需求所得到的基本满足，因为“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老子》第七十六章)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就若锋利的刀易折断、高大的树会砍掉一样，无限膨胀、扩张的本能和需求给人的生理肌体带来的是难以承受的压力，以至于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最终使人的生命走向枯萎。相反地，只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守住内心的纯朴而不去放纵欲望，人才能避免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因此，老子告诫人们：应该“用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理念去培育生命的根基，用真朴之性去充实生命的精神。”【6】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庄子对“天人合一”给予了进一步的明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庄子·大宗师》)所以，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平等地和谐共处——不是天来适应人而是人去适应天。道家的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强烈意识要求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应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它认为做到“天人合一”才是人类的持久长生之道。

当代的西方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们在追求高消费、时尚生活的同时又深受环境污染、食物污染和各种因污染而导致的疾病的困扰。痛定思痛，人们反思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结果催生出当代西方生态思潮。西方生态学者认识到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坚信应该改造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并加以摒弃。不仅如此，他们惊喜地发现在自己的文化圈之外，曾长期被视为“他者”而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根植起“天人合一”的思想基因。弗里乔夫·卡普拉认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的两者的基本一致。”【7】从《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东方的绿色“圣经”中，西方生态学者获得了中国古代先哲的生态智慧，受到了“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的启迪，开始崇尚尊重自

然、克制贪欲的简朴而真诚的生活。对于长期浸淫于“天人相分”而二元对立的西方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副难得的清醒剂。“天人合一”从根源上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其蕴含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之生态内涵契合于西方的生态整体主义，尤其是深层生态学。阿伦·奈斯就明确说过：“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道家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对一切存在物的同情、尊重和热爱，这种同情是源于自爱，但是自我(self)是大我(Self)的一部分，因此，自爱不是自私的自恋。”【8】

至此，在西方吸收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践行其生活哲学以绿化自身的文化生态和实现文化自救的同时，人类长期迥异的天人观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契合。当然，中国的天人观早就在那里，而对于西方来说这种契合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被生态危机所迫。

#### 4.2. 天人观的文学性解读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出现距今仅有短短五十余年时间，其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却可以追溯到亨利·梭罗于1854年出版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在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梭罗进行了一场回归自然的实验，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一次充满自然主义诗意的生活。1949年，《瓦尔登湖》被徐迟译介引入中国，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梭罗及其所携自然清新之风逐渐受到国内众多诗人和作家的追崇，有的甚至成为言必称其的“皈依者”。他们感动于梭罗所悟出的人生真谛：如果希望更为从容而淡定地享受人生，“人不应为物所役，不必为了攫取更丰厚的利润去拼命劳作，而应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与自然的交流与融合，在与自然的交流融合中享受天地间最高的精神愉悦”【9】；他们的作品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坚守在自然纯真和人类本性之中。这又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西风东渐”，引领中国文学进入生态主义的时代，成为兴起于西方的世界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的“梭罗们”却无意或有意地舍近求远了：无意是因为疏于研究祖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有意则是因为“唯西方马首是瞻”。殊不知，梭罗的思想和华夏的传统经典有着深刻的渊源，其中首推道家学说。根据阿瑟·克里斯蒂的考证，梭罗从接触到接受道家思想的重要途径是通过研读法国汉学家译介的《老子》一书，他还直接或间接地吸取庄子的精神以完善自身的哲学体系。梭罗曾经说过：“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10】这种强烈的自然意识与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人、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在他们眼中都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分子。道家所倡导的清静安宁、空灵悠远的生活方式令梭罗思绪万千——“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11】他将自己超验主义的体验和思悟融入到《瓦尔登湖》

中，呼唤人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力图唤醒人类对自然的意识和对自身自然属性的意识，以期最终回归自然，与天为一。由此看来，“探讨梭罗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吸收借鉴，将其实实在在地主要是对《庄子》其书与庄子其人的理解、仿效、表述，应该说并不过分。”【12】(105)两千多年的时间间隔和两万多公里的空间距离，“不但没有隔断梭罗与《庄子》的思想联系，而且实现了跨越式的会通。”【13】

世界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也应该进行跨越时空的追溯，《庄子》当之无愧，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折射出中国古代先哲“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作为一部说理性散文集，《庄子》的行文体裁已经脱离语录形式：不是仅凭推理和思辨的方法而是更多地采用感性的形象、强烈的情感等文学手段，去表述理性认识之自然和人生，以及阐明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其恣肆汪洋的文笔、飞越雄浑的意象、丰富奇特的想象以及旷达滋润的情致，无一不让人感受到那独树一帜的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林语堂曾用这样的语言来赞誉其散文之美：“老子的哲学成就了庄子的诗歌。”【14】《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对后世历代的哲理著述、文学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尽管奉《瓦尔登湖》为鼻祖和范本的世界生态文学正在汇聚成蓬勃大潮，但是“近代(尤其现代以来)人们曾轻慢过庄子……大洋彼岸的梭罗，以他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全面认同、体悟……创作出了极具文学色彩的哲学巨著《瓦尔登湖》……从梭罗身上，可以依稀看到庄子的身影!”【12】(106-107)

所以，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中国的庄子就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对人类的天人观进行了文学性解读。后继的西方生态文学家们或迫于人类生态环境的压力，或直接吸收、融通了来自中国古代先哲的生态智慧。这正是生态文学的另一面，代表着天人分合观在文学上的趋同。

#### 5. 结束语

面对20世纪初中国的混乱和贫穷，罗素看得更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数千年，如果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那将给全世界带来幸福。”【15】今天，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战胜全球性生态危机威胁的最有力之武器。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也不能够丢弃这一传统，而对于中国的生态文学家及学者们来说，则更应该潜下心来发掘出其中丰富的生态内涵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建构，从而为人类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 REFERENCES

- [1] B. McKibben, *The End of Nature*,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New York, 2006.
- [2] R.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3:58.
- [3] E. Smith, *Dropping the Subject: Reflectings on the Motives for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Branch, Johnson, Patterson and Slovic (Eds.),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Moscow, 1998:30.
- [4] D. Dreese, *Ecocriticism: 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Peter Lang Publishing, New York, 2002:4.
- [5] Nuo Wang, *Euro-American Eco-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3:2.
- [6] Gang Wang, *Natural Dimensions of Lao Zi's Ecological Thought*, Academic Exchange, 2008(6):20.
- [7] F. Capra,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Bantam, New York, 1983: 412.
- [8] B. Devall, *Sessions G. Deep Ecology*, Gibbs Smith, Utah, 1985: 11.
- [9] Shu-yuan Lu, *Poets and Nature's Death — Comparative Study of Thoreau and Yuan-ming Tao*, in: Dai-yun Le, Alain Le Pichon, Lin-sen Qian (Eds.), *Dialogue Transculture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eijing, 2010:47.
- [10] H.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V)*,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06:205.
- [11] H.D. Thoreau, *Walde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82:12.
- [12] Su-wei Wang, Hui-rong Zhang, *A Fluttering Butterfly Flying beside the Azure Walden - The Spirit Bond Between Chuang Tzu and Thoreau in Chuang Tzu and Walde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011(2).
- [13] Ying He, *Thoreau's Absorption and Combination of Chuang-Tzu*,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10(3): 50.
- [14] Gu-ying Chen, *New 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uang-Tzu*,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983: 11.
- [15] B.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6:6.